

沙莲香
著

沿着中庸的美与丑

中国民族性研究随笔

沙莲香 著

沿着中庸的美与丑

中国民族性研究随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沿着中庸的美与丑：中国民族性研究随笔/沙莲香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300-26324-3

I. ①沿… II. ①沙… III. ①民族性-研究-中国 IV. ①C95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2297 号

沿着中庸的美与丑

中国民族性研究随笔

沙莲香 著

Yanzhe Zhongyong de Mei yu Cho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0.25 插页 3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9 000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前言

这本关于中国民族性研究的随笔，是随心而发的，没有设定写作大纲，但在每次开机写作时，几乎是从头阅读之后再接续写的。因此，写作思路大致是一个连续的状态。

我关于人的研究源自“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后来又把对人的研究具体化为民族性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东渡日本于东京大学期间开始的。这个研究与出国时定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种情况反映在写作上，则是将民族性的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作一前一后安排，我姑且用两个板块表示，并划归为“中国民族性研究回顾”这个部分。

回国之后，一方面有课堂教学任务，讲授社会心理学。一方面进行学术研究，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包括了对社会心理学理论上的探索，以及后来对心理现象的模式化研究即心理现象的计算机模拟研究，与此同时，也进行了传播学的研究并主编了传播学的教材《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谜》。这说明我研究社会心理学并非科班出身，而是从多学科相交相助的交叉

点上步入这个复杂的领域。学科“交叉”固然有益于思考上的深入与扩展，但同时又由于“不专业”，就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关于中国民族性的研究则是从一个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开始的，并且延续成了我几近终生的追求，而中国民族性的研究一开始便遇到了“中庸”，从而在后来的研究中逐渐展开了对中庸的更多研究。这种状况反映在写作上，就是本书以“中庸”为写作主题，并构成了这本书的另一个板块，即“中庸”部分。

“中庸”部分，在学理上是对中庸所作的理解与解读，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文化的“有对无对”和“中庸人格”，这是不能不言及的议题，是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对中国人人格的认知，是中国民族性研究应该到达的视域。二是“关系体”，这是在公共文明问卷调查中发现并提炼的概念，用以表示公共生活中，当人们面对不文明行为时的心理共鸣，即对他人不文明行为表示“可以理解”。这是公共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可以说对负现象产生的心理共鸣也是一种中庸性格。三是“打开中庸，面向现代”，这是对中庸的一种破解。而一旦将中庸分解开来，在我们面前展现出的则是它无尽的丰富多彩性。中庸不只是二维，不只为“均衡”，而是三维、“一分为三”，其中的“三”才是“创造性”立于其中的“空间”，是激起中庸活力的结构因素。在“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上看中庸，引申出相互补充的中庸思维与间性思维。中庸思维带有平稳的、均衡的特点，而间性思维是一种立体的、多维的思

考方式，一种创新的、灵活的思考品质。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遇有“访谈”的事情，其中孙庆忠教授的访谈将民族性研究追根究底、理路清晰地发表在他所在学校的学报上，因此，这个“关于民族性研究的一次访谈”在书中是放在“中国民族性研究回顾”部分和“中庸”部分之间的，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这个“访谈”之后，才确实地进入有关“中庸”的写作。

写完了研究“随笔”，开始考虑将以往发表的东西整理出一种主题，名为“人文精神的思考”，这样一来，就在“中国民族性研究回顾”和“关于民族性研究的一次访谈”之间插入了“人文精神的思考”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是发表在学术刊物和参加学术研讨会时发表的文字，大致体现了社会心理学研究、民族性研究中对中国文化的一些思考。

全书的重点是关于“中庸”与“美丑”的写作即“沿着中庸的美与丑”部分，而对“中庸美”的审视则是我表达的主题，也是我长久的关注与心愿。因此，全书也就自然而然以“审美人生”终了。

写罢书稿，回过头来想：把这个研究随笔定名为“沿着中庸的美与丑”，几乎是我的一种随心所欲，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预定，带有不少的潜在性，潜藏着我对“中庸”研究的矢志不渝。

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不偏不倚，为均衡；中庸时中，已将它命定于万物之千变万化，随时而在。

“沿着中庸”暗含了对中庸“平稳”和中庸“变化”这两个向度的解读。

“中庸”如同万事万物一样，在形态上是“正态分布”，人如此，山如此，川如此，建筑物和日用品亦如此，都稳稳当当地存在着，又于不经意之间变化着。

正态分布在书中有较多解释，它揭示了现象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的比率，即绝大部分构成要素聚集在中间区域，少部分构成要素分布在两侧的尾部，美丑作为一种时尚现象总是“少”有，存在于这个正态分布尾部。“正态分布”，其实是这样一种形态，它在本质上揭示出任何现象都在正态分布曲线上无时不变以及少数优劣必然在变化中出现。中庸以“正态分布”的形式存在着和变化着，千姿百态，千变万化，以及丑丑美美随机而出，或美或丑。

“沿着中庸的美与丑”暗含了我们的生活始终是走在中庸“形迹”上的，包括人们的举止步伐，穿着打扮，言语沟通，迎来送往，亲情互往，无不呈现为“中庸”的成双有对、往返互动的形式；也暗含着美与丑附着于中庸，审美与中庸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是二又是一。审美的自觉意识表现在行为上被叫作“得体”“是称”，都是对中庸形态的把握与润色，表明生活方式中的“方式”潜伏在中庸里头，这是“中庸”的一种不可逾越，也是书中“沿着中庸”的依据。这种生活“方式”潜于中庸的不可逾越性便是书中“沿着中庸”的意思，意味着所有现象都以中庸的形式存在和变化。

此书是研究随笔，除了有当前新的内容还有以往的

一些旧作，都是研究生活的构成。把过去的研究放在当前研究的面前，感觉到研究的“当下与直观”之所不可摧折：过去的想法与论说是现在的“再也不可能”，那么，今日的想法与论说也就是以后的“再也不可能”。于是，这书也就成为了“对自己的交代和预定”，往前生活莫回眸，去走那人生尚有意义的路。

沙莲香

于世贸公寓

2018年1月

目 录

目 录

✧ 中国民族性研究回顾 一

大学生生活 一

从此教师爷 四

清华大学八年 六

东京大学留学 八

步入社会心理学学科 一五

附文一 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

总体框架 一六

附文二 经济与心理——与马克斯·韦伯的

心理学对话 一七

附文三 社会心理现象计算机模拟及其

方法论意义 三五

走进中国民族性研究 六七

✧ 人文精神的思考 七二

附文四 “己”的结构位置——对“己”的

一种释义 七三

附文五	孟子“性善说”的社会心理学 解读	九〇
附文六	人文精神召唤	九八
附文七	论中国人的素质构成与社会 发展	一〇四
附文八	耻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	一一四
附文九	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研究的 主导观念 ——兼说民族性建设	一二二
附文十	文化自觉与自我认同	一四〇
✧	关于民族性研究的一次访谈	一四六
	“悲情多于激情”的民族性研究	一四六
	个案的灵魂召唤	一四九
	女性的“独一无二”	一五二
	对“80后”的注重	一五六
✧	中庸	一六〇
	“有对无对”	一六一
	中庸人格	一六五
	公共“关系体”	一六九
	打开中庸,面向现代	一七六

一分为三	一八四
中庸曲线及其统计学意义	一八六
间性思维:创造性发生在“边缘”	一九〇
* 沿着中庸的美与丑	一九五
美是怎样的“存在”	一九六
中庸的美	二〇七
生命者美	二一六
审美人生——人在丑与美之间	二三四
* 结语	二三八
* 参考文献	二四〇
* 附录	二四五
附录一 见证与诠释:中国民族性变迁 30 年 ——沙莲香教授访谈录	二四五
附录二 太庙古柏——“天人合一”的 绝美	二八一
附录三 武英殿前的苍松	二八七
附录四 石狮和十八槐	二八八
附录五 瓷上园林——瓷上美	三〇一
 后记	 三一

对于中国民族性展开研究，大概是我“人到中年”的际遇。

研究中国民族性，我不曾想到，更无预设，但生活的堆积沉重到了一种限度也许就有可能对那些“刻骨铭心”的事件不时地突发奇想。

大学生活

1956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学生年代。亦喜亦惊，亦乐亦惧。

1956级哲学系学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在高校统一招生之前大约一个月的时候，提前考试录取的，据说落榜者尚可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哲学系当年录取了200人，分七个班。每个班，考分首屈一指者任班长，也是一种威风 and 快活的事。七个班长中没有女生。事实上，女生亦相当优秀，但在文雅风下含蓄着，那是彬彬有礼的一

代文才女子。怀念那个年代的女大学生风貌。

1956年入学的时候，恰逢“读书”的时光。何思敬当时任哲学系主任（后来的系主任为齐一、方华、马奇、吴江等诸位学识渊博的前辈）。当时为这批首届本科学生构筑了即便是现在看来亦属上乘的授课老师阵容，数学有关肇直，逻辑学有王方鸣，物理学有林万和，心理学有彭飞，中外哲学史有石峻和尹明以及苗力田等著名学者，给学子奠定了极好的知识结构。后来证明，这批学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群体。不幸的是，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这个群体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1957年春夏之际，在大家始料不及之下，来了反右派运动。在这个运动没有来之前，有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号召，称之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让以“智慧”之名而自豪的“哲学生”比较快地行动了起来，活泼泼地参与“鸣放”当中。其结果，有几位同学被打成了右派，而我们这些同学坐在桌椅之旁批判自己的同学却不知道反右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反右派的内情。当时的批判是直面的，揭发式的，上升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是人人站稳立场、人人与右派划清界限的“革命”行动。那么，反右派是怎样又怎么可能促使一大批青年学生身上产生出对自己同窗的“革命”行动的？这是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的问题。当时，“右派”是啥，并不知。但是，“批判右派”是党的号召，这个号召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一个个右派是一个个标本，在对右派“不知是啥”的情况下批判右派，具有绝大的诡秘性。这种诡

秘性对潜在意识的勾引则是对“右派”同学某句话的鬼魔般“好奇”和“逼问”。时至今日，这些都是极其沉痛的同窗往事。

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在毕业时都被分配到了工厂或农村进行“改造”。潘世元和刘达孝在门头沟煤矿劳动“改造”。潘世元是来自上海的秀才，很会独立思考，有着直言不讳的率性，对待同学善言善交，是一位善心厚重的同学；刘达孝是贵州来的高中毕业生，年少英俊，才华横溢，聪慧且耿直。在“劳改”中，潘世元不堪折磨自杀，刘达孝成了精神病人死于病患。被打成右派的李德、吴汝文、于云鹏等同学经历了一生坎坷，受尽摧残和侮辱，于云鹏几次被批判，流离失所以至于乞讨求生、露宿街头，最后捡了一条硬骨头性命。

反右派运动之后是“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很多学生都下乡。我是在北京郊区的西黄村，住在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家里。大炼钢铁高潮中，眼看着两位老人把家里的铜镜、铜盆，家里所有的铁器都拿出来炼钢炼铁了。回想起来，自己在那个时候无动于衷，没有惋惜过，而是被裹在“大跃进”的巨流洪水中，感到两位老人响应号召、顾全大局，是“革命”举动。后来曾去看望过两位老人，却也不曾意识到这“革命”是对他们日常生活和家当的无情“剥夺”，是对他们这一家的“伤害”。“三面红旗”运动之后回到学校，系主任吴江要求学生“坐下来读书”，“瞅天花板”做思考。

“三面红旗”运动之后有个思想改造运动，运动中

大学生人人检查思想“向党交心”，以至于公开自己的日记。这个“思想改造”实际上使每个人像剥皮一样把自己剥个精光，检查深刻的则作为典型，被抬出来“现身说法”。毕业时，十年大学同窗带着种种迷惘各走他乡去经历，去适应。

大学生活所遭遇的人性之殇，或许成为我日后对“中庸”比较敏感的一个早期因素。

从此教师爷

教师常被叫作“教师爷”，但实际上是“书匠”，以书为主要工具，带领并教育学生读书与行事，在这个语意下教师爷则是教师这个职业的代称。我一生教书为业，几近“匠人”，为自己一生深爱而不悔。

人大哲学系首届本科是五年制。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学校提前调出一些学生当了教师，被称为青年教师，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批人仍被称为青年教师。这批青年教师也就成了校园里的一种参与力量，因此，他们更多地体验到了校园里的这场大革命。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北京几大院校的学生很快地行动了起来并分成两派。如同其他院校一样，中国人民大学也分成了两派，以大操场（现在哲学、历史、中文等专业所在的人文楼及楼前草坪）为界，南北对峙。两派都是自组织，自成一体，自有专案组、战斗队，自有参谋室，相互揭露对方“问题”；开始是大喇叭对战，后来相互对立到了不可开交的时候便动用“武

力”搞武斗。

因为反右派运动的“教训”，“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教师比较谨慎，家庭或个人有“历史问题”的，观望者较多。但是，运动的风暴很快迫使教师“站队”和“表态”，没有入“派”的教师极少。教师、一般干部和工人，大部分分别参加了两派，“派别”成了当时鉴别是“造反”还是“保守”的“立场”的标志，在激烈的情
况下还出现了“一家两派”。

人大的几位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被“揪斗”并受到了残害，胡锡奎、郭影秋、孙泱、李培之无一幸免，孙泱和郭影秋遭受的迫害尤其残酷。李培之是王若飞的夫人，被抓到暗室里严刑拷打，但幸免于死。孙泱是朱德的挚友孙炳文烈士之子，曾任朱德秘书，一位才子（他的妹妹孙维世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兼副院长，多才多艺，在“文革”中死于囚牢，年仅47岁）。时年52岁的孙泱在“文革”中是被活活打死在地下室的。郭影秋“文革”开始时是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搞“四清”，回校后被抓起来审讯批斗。他被抓起来审讯的过程中，造反派专门棍打肋骨和后脊骨，造成他后来一条腿功能丧失，只能锯去那条腿。^①那时的人大校园不是大会批斗“走资派”，便是让“走资派”戴上各种纸帽子游街，往脸上抹稀泥，搞体罚，辱尽人格。从郭影秋的《往事漫忆》中知道，在审讯的过程中，造反派把刀、绳索等物放在他的房间，暗示他去“自杀”。人大造反组织对郭影秋的“斗争”，让苏家坨的农民知道了，农民自发组成700人代表来到人大的批

①郭影秋，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斗大会，这成为第一个“调动农民斗学生”的事件并把罪名安在郭影秋头上，这件事震惊了“文革”领导层，也轰动了全社会。围绕“斗争”当权派郭影秋，人大迅速分成了“反郭”和“保郭”两派，“保郭”派的中坚是学生、工人和部分教师，占有多数，但最终仍然没有保护住这位受人尊敬的校长。群众运动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势力，群众心理演化为一种力大无比的行为力量。

两派之间的“势不两立”造成了教师群体的互相攻击，直到工人阶级进驻高校，“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两派教师搞“大联合”。当时已全面停课，教师每天开会，“早请示”，“晚汇报”。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大联合”结束后，教师下去劳动锻炼。人大教师的大队人马去了江西的鹰潭，躲过了血吸虫病区，躲过了病患的隐匿威胁。

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我被分配去了清华大学，一去八年。

清华大学八年

到了清华大学之后，我的家由中国人民大学搬到了清华大学附中院内的职工宿舍楼，距离清华大学的中心地带比较偏远，但对清华附中的一些课上课下生活逐渐熟悉了。我的女儿时为四岁多的小儿，常常观看中学生在这个宿舍楼一层大房间的体育课，时间长了就和中学生熟络起来，一次还把几位中学生请到家里吃糖果，被年轻的邻居看到了为她叫好。小女接触了淘气的